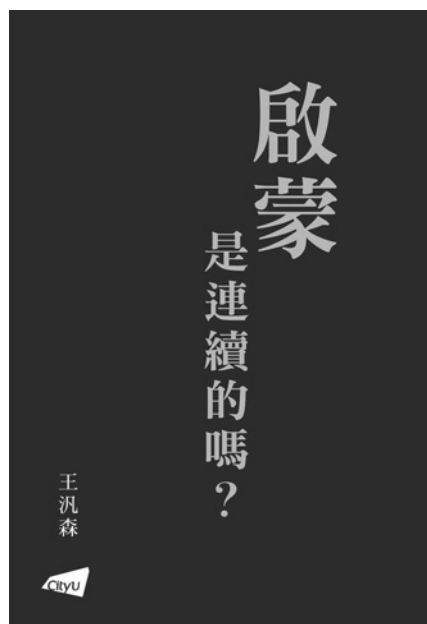


五四思想史如何「重新問題化」 ——評王汎森《啟蒙是連續的嗎？》

● 段 煉

《啟蒙是連續的嗎？》採用「前後左右」的觀察視角，「前後」特指從五四思想之起源直至「後五四時代」的思想變遷；「左右」則側重探討五四新文化運動在實際歷史中擴散、浸染等各方面的影響。



王汎森：《啟蒙是連續的嗎？》
（香港：香港城市大學出版社，
2020）。

鑒於五四新文化運動引發的思想劇變以及對於二十世紀歷史的深遠影響，其與維新變法、辛亥革命

等重大事件一道成為清末民初思想文化「轉型時代」的高潮之一^①。此後百餘年間，一方面，報刊、書信、日記、回憶錄、口述史、影音圖像等多元史料層出不窮，極大豐富了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歷史圖景；另一方面，圍繞五四時期「民主」與「科學」、家庭革命、文言白話之爭、性別認知、地方與世界的互動、科玄論戰等議題，也產生了諸多啟人心智的歷史詮釋——無論是「從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的階級分析與「向新民主主義的過渡」的革命論述^②，還是從「救亡壓倒啟蒙」到「沒有晚清，何來五四」的反省與檢討^③，既充分展示了不同時期知識人「重訪五四」的深度及廣度，也凸顯出五四新文化運動歷久彌新的思想魅力。

適值五四百年紀念之際，王汎森先生推出其五四新文化運動的研究新著《啟蒙是連續的嗎？》（引用只註頁碼），嘗試以「前後左右」的

觀察視角，「探索這個巨變時期的心靈世界中，各種思想元素交互錯綜的意義」（〈序言〉，頁vii）。其中，「前後」特指從五四思想之起源直至「後五四時代」的思想變遷；「左右」則側重探討五四新文化運動「在實際歷史中擴散、浸染、薰陶，在生活、氣質、心態、人生觀、時間觀，乃至習癖、偏好，或對於事物優劣好壞的判斷等各方面的影響」（〈序言〉，頁viii-ix）。本書並非五四新文化運動某一特定主題的研究專著，而是由序言、附錄以及九篇相關論文所構成的一部五四專題論文彙編，貫穿了作者二十餘年來對於五四思想史研究「重新問題化」的省思與睿見④。

一 內容與結構

依作者關注重點，書中論文大致可以分為三組：第一組包含三篇論文，敘述清末民初激烈的思想變化。〈思潮與社會條件——新文化運動中的兩個例子〉為本書中撰寫最早的一篇論文，討論在清末民初新舊嬗遞的歷史進程中，社會政治條件（如鐵路國有之爭、袁世凱稱帝、張勳復辟等）如何在全國與地區的舞台上扮演思想「轉轍器」的角色。〈從新民到新人——近代思想中的「自我」與「政治」〉說明在近代思想轉型的背景下，「自我實現」與「自我完善」得以實現的條件、心理特質及其後果。〈中國近代思想中的「未來」〉則聚焦清末民初的「時間意識」，以及由此衍生而成的

知識人關於未來世界的想像、言說與行動的重大變化。

第二組論文以反思五四思想史研究方法論為中心。〈五四歷史的兩條線索〉關注由「正信者」（真誠信仰者）和「半信者」（信而有疑者）交光互影、共同演繹而形成的「模糊階段」（confused period）的思想史意義。〈思想史與生活史的聯繫——五四研究的若干思考〉從五四運動與生活世界的變化入手，說明五四的價值觀念與評判標準，如何通過生活化的形態（如文藝作品、戲劇表演、演說等）滲透到社會各個角落與普羅大眾的日常生活之中。〈啟蒙是連續的嗎？——從晚清到五四〉為本書中最新完成的一篇論文，關注晚清、辛亥到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思想「連續」的種種不同形態——有時是單純的傳遞，有時是「轉轍器」式的關係，有時則是思想與政治相互激發而前進的關係。

最後一組的三篇論文分析後五四時代當中五四思想的新面向與新趨勢。〈後五四的思想變化——以人生觀問題為例〉討論人生觀議題如何與「社會科學」詮釋體系的興起和黨派政治抉擇彼此糾纏，進而帶來私人領域的逐步政治化。〈反主義的思想言論——後五四政治思維的分裂〉着重討論後五四政治思潮，隨着「反主義」人士與思潮的出現，進而挑戰「主義」定於一尊的權威；作者指出，「反主義」的趨向，一方面反襯出「主義化」強大的思想整合力，但另一方面，空談「主義」的「無治狀態」，也帶

作者嘗試以「重新問題化」的態度，追索「啟蒙」之於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思想史意義，進而延伸至對於五四研究典範的多元反省。過往五四研究的現象之一是重「起源」遠過於「過程」，然而思想運動在發展的過程中有種種變化創新的可能。



傅斯年在五四運動時期曾經擔任學生領袖。(資料圖片)

近代中國的思想劇變——晚清、辛亥到五四新文化運動這三個階段，可以被考慮為一個連續的格局；但所謂的「延續」顯然已不是簡單的連續。人們將歷史過程的豐富性化約為理所當然的關聯，以致出現將「理想中」的五四作為「歷史上」的五四來闡發。

來實際生活當中「政治空洞化」的「主義政治」。此文與本書附錄〈「客觀理智」與「主觀意志」——後五四思潮中的兩種趨向〉對於後五四思想界「客觀理智」與「主觀意志」兩種思想趨向的分歧，實可互相參照。〈傅斯年——一個五四青年的挫折〉一文係作者早年出版的專著《傅斯年：中國近代歷史與政治中的個體生命》(Fu Ssu-nien: A Life in Chinese History and Politics)的其中一章^⑤，藉傅斯年這位五四運動領導人的經歷說明，雖然深受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洗禮，知識人在後五四時代激烈的政治衝突之中，其學術理想、政治抱負甚至個人的安身立命，皆面臨「困窘、歧異、矛盾及微妙的變化」(〈序言〉，頁xiii)。

王汎森在中國思想文化史領域深耕既久，書中絕大部分論文曾收入作者業已出版的各類專著，並在學界產生廣泛反響。此次香港城市大學出版社將相關論文彙為一編，

有心的讀者當能更為透徹地把握作者在五四思想史領域拓展的新問題、新論域與新路徑。

二 「啟蒙」何以「連續」至此

本書書名《啟蒙是連續的嗎？》採自第六篇論文標題，雖未必是(或無意成為)對本書核心論旨的完整概括，卻透露出作者嘗試以「重新問題化」的態度，追索「啟蒙」之於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思想史意義，進而延伸至對於五四研究典範的多元反省。過往五四思想史研究典範之一，即針對五四新文化運動與西方啟蒙運動的關聯，進行各類比附或釐清，以實現合乎研究者自身期待的界定與評估。余英時指出，五四其實是一個「文化矛盾」的時代，注定具有多重面向(multidimensional)與多重方向(multi-

directional)，實無法將其視為「一個單純而又融貫的運動，導向某一預定的結局，好像受到一種歷史的鐵則的支配一樣」。因此，余英時強調，須重視「啟蒙運動規劃」之下，五四思想世界中那些變動不居的「心靈社群」(community of mind)，以及由此產生的「不斷變動又經常彼此衝突的五四規劃」⑥。

這一反思在〈啟蒙是連續的嗎？〉一文之中得以深化與具體化。王汎森強調，過往五四研究的現象之一是重「起源」遠過於「過程」，然而「思想運動像一個有機體，它在發展的過程中有種種變化創新的可能。譬如五四先有一個颱風眼(以新文化運動為主)，在『過程』中連接上另一個颱風眼(以五四的愛國運動為主)，甚至到了某一階段是多個颱風眼的『共伴效應』」(〈序言〉，頁viii)。這呼應了卡西勒(Ernst Cassirer)在其論述西方啟蒙思想的經典著作中所言：「啟蒙思想的真正性質，從它最純粹、最鮮明的形式上是看不清楚的」，「在這種形式中，啟蒙思想被歸納為種種特殊的學說、公理和定理。因此，只有着眼於它的發展過程，着眼於它的懷疑和追求、破壞和建設，才能搞清它的真正性質」⑦。

因此，作者一方面認為，近代中國的思想劇變——晚清、辛亥到五四新文化運動這三個階段⑧，可以被考慮為一個連續的格局：「這幾十年思想的發展雖然參差不齊，不斷地在擴增或變化，但大致看來仍有個延續的趨勢」；但另一方面，作者的論述重心則在於，所

謂的「延續」顯然已不是簡單的連續，其中最大的誤讀源於現代人往往以「後見之明」，「把歷史中的一些頓挫、斷裂、猶豫的痕迹抹除，使得思想的發展，看起來是一個單純而平整的延續」(頁208)。這也使得人們對於「啟蒙」原本具有的參差多態習焉不察，轉而在不同目的論左右之下，將歷史過程的豐富性化約為理所當然的關聯，以致出現將「理想中」的五四作為「歷史上」的五四來闡發。

而王汎森對於五四新文化運動當中「啟蒙」意涵的解讀，更側重於他所重視的「過程式理解」或者「歷史的事實」。因此，五四是否屬於「中國的啟蒙運動」(或「中國的文藝復興」、「新民主主義革命」等)，實乃言人人殊的價值判斷，毋庸過份糾纏。對於史家而言，更重要的使命在於，充分考慮「歷史現場」蘊含的諸多可能性以及時人對此的不同抉擇，以此呈現「啟蒙」的「源與流」和「常與變」。惟其如此，方能以動態的思路去理解：從晚清到五四，「啟蒙」何以「連續」至此？

具體而言，王汎森指出，在五四啟蒙思想的連續性議題之上，需要充分關切如下兩大問題：

一是政治與思想如何交互成為對方的「轉轍器」。從晚清到五四的思想舞台上，觀念的力量推動革命、締造共和，使得許多原本的核心思想與邊緣思想發生地位互換(如對於王權/共和、祭孔祭祖/反迷信、四書五經/新學等的態度)，並造成一個時代「感知架構」的變

王汎森對於五四新文化運動當中「啟蒙」意涵的解讀，更側重於他所重視的「過程式理解」或者「歷史的事實」。因此，五四是否屬於「中國的啟蒙運動」，實乃言人人殊的價值判斷，毋庸過份糾纏。

作者對於五四思想史「重新問題化」的另一重洞見，在於重視五四思想史中的「模糊階段」的歷史意義。歷史變化不只發生在兩極的純粹狀態，「轉型」也不一定是目的論式的、定向的。

化。有些新思想進而透過國家的力量成為「建制性遺產」(institutional legacy)，並藉由官方的力量強力推展，成為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頁211-16)。從胡適到陳獨秀，在共和革命之後都深感思想倫理與共和國體之間的不協調，故而醞釀出不滿與動力，進而希望在思想文化上「替中國政治建築一個革新的基礎」(頁220)。這與本書〈思潮與社會條件〉一文的論述彼此配合、相互印證。

二是在不同「背景文化」之下思想議題如何延續拓展，如婦女解放、白話文、家庭革命等，「許多看起來從晚清一直延續下來的思想議題在各個時段中的幅度、廣度、強度、滲透度等仍有所不同；此外，因各個時代『背景文化』的相異，即使是看似一樣的概念或思想、詞彙也表現出不盡相同的意涵」(〈序言〉，頁xi)。王汎森指出，在晚清時期尋求富強與進化論的「背景文化」之下，對於「國」的認知，總體趨於建立一個「民族帝國主義」式的國家，以成為「天演之強者」。然而五四以來，思想界受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後「公理戰勝強權」、無政府主義和烏托邦思想的影響，「國」的觀念也漸生歧異。一方面，五四運動無可迴避地成為一場「外爭國權，內懲國賊」的愛國主義運動；另一方面，「國」又與家庭、宗族一道成為需要被徹底批判甚至破除的對象，從而形成帶有某種超越性的普遍主義思考——此類歧異的想法，有時甚至可能聚合於同一人身上(頁224-27)。因

此，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之際，部分知識人雖然依然服膺進化論的思想，但前述「民族帝國主義」的訴求逐漸淡化，對於如何進化到一個「新境界」的想像反而日漸濃烈。晚清到五四時期這一系列「背景文化」的嬗變，使得相似議題的歷史意義可能大為不同，也因此帶來啟蒙形態的連續與斷裂、意涵的增殖與衰減。

三 「模糊階段」的歷史意義

作者對於五四思想史「重新問題化」的另一重洞見，則在於重視五四思想史中的「模糊階段」的歷史意義。依作者之見，慣常以所謂「轉型」(transition, transformation)來描述如五四新文化運動一類的變動時代，多少蘊含着「轉型」兩端存在某種清晰穩定狀態的認知。由此形成的「轉型」，則不言自明地成為合乎某種「後見之明」的判斷與期待。作者提示，歷史變化不只發生在兩極的純粹狀態，「轉型」也不一定是目的論式的、定向的，而是「有許多臨時起意的、前途未定的摸索」，充滿參差不一的思路，含混、曖昧的緊張(頁61-63)。因此，「在五四新文化運動紛繁萬狀的『過程』之中……既有強而有力的『理性』(logos)力量，以不容辯駁的態度導引着思潮的前進。沒有這條線索，便沒有所謂的『五四』，但同時在歷史發展的『過程』中，也有『感性』(pathos)這條線索(或許多

線索)時不時地在與它交會」(〈序言〉,頁ix)。身處其中的局內人的「轉型」,是否真如後人所見那樣理所當然、不證自明,值得再思。

在〈五四歷史的兩條線索〉一文中,作者指出,新思潮影響之下,大致會出現兩類人群,一種是新思想的推動者,以及許許多多受到他們影響的「正信者」,如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的陳獨秀、胡適、李大釗、傅斯年等人;另一條線索則是在模糊、頓挫不定的過程中,因各種原因而皈依的各類「半信者」,以及在此過程中所發生的「許多非線性、非目的性的、模糊的力量移轉」(頁60)。他以晚清時期「維新」一詞的使用以及靠着「假維新」而一步一步向上的投機者為例,說明如果只是從「正信者」的角度去觀察歷史,則對歷史實際發展的認知會有所缺陷。

有鑒於此,作者指出「模糊階段」中有許多易被忽略但卻值得關注的現象。譬如「思潮的非線性擴散」(頁65),即表明變動時代的不同思路之間的「轉型」不一定是線性的關係,而是如同毛細管或小徑分叉的花園一般,通過思想逐層浸潤或「語意叢聚」(semantic field)的聯動方式發生改變。五四彷彿「颶風」,時人未必直接接觸,卻遠遠地受到它的裹挾,或是被逼着要對它提出的重大議題有所回應。在「銅山崩而洛鐘應」式的牽連之下,五四新文化運動一是激發了時人的省思,迫使人們接觸、了解、評價新思潮,以此揣摩風氣,調整自身的文化立場;二是激發出「反命

題」,即便是立場保守者也需要對此強力震盪而成的議題有所回應,進而通過各種象徵性行為形成動員的力量。

從本書中提及的人物來看,無論是蔣介石還是張恨水(頁68、73),不同人士的思想光譜濃淡有別。不論其最初動機為何,但均在努力調動一切資源因應時勢——其中既有「過渡時代」之類的說辭,也有「合兩個人格為一個人格」式的匯流。這一時期的思潮以及針對這些思潮的接納與排拒、體驗與言說,都在彼此競逐。這是知識人在「預流」之際對於時代旋律複雜的適應,它們「甚至逐步創造了與原初不盡相同的方向,後來也可能在某一個節點上,分解或散逸而去」(〈序言〉,頁x)。因此,作者說「模糊階段」是一個新舊標準、事物混雜在一起,曖昧不明的階段,「舊概念失去意義,新觀念迅速流行,無時不在地重構,是一個軌迹不定的運動,所以不能用處理它再度回到穩定時期的態度來面對它」(頁63)。

四 餘論

顯然,本書對於五四新文化運動「重新問題化」的呈現方式,深受晚近以來新文化史研究範式轉向的深刻影響。作者自陳,因受到法國大革命史家達頓(Robert Darnton)影響,開始關注五四新文化運動的「街頭層次」(頁194),以及五四如何影響人們的意識、心態乃至日常生活世界,故「試着將『思想史』

五四新文化運動一是激發了時人的省思,迫使人們接觸、了解、評價新思潮,以此揣摩風氣,調整自身的文化立場;二是激發出「反命題」,即便是立場保守者也需要對此強力震盪而成的議題有所回應,進而通過各種象徵性行為形成動員的力量。

王汎森對於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思想史研究，業已跳脫對其本質的探析和功過的評價，轉而致力於將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啟蒙意涵，從現代主義的諸多預設立場與目的之中解放出來，視之為一個充滿多元競爭又存在各種可能性與可選擇性的開放系統。

與『生活史』打成一片」(〈序言〉，頁xiii)。王汎森強調：「如果思想是生活的一種方式，那麼就有思想在生活中如何變得『可行動化』(actionable)的問題。」^⑨因此，作者在書中審視的對象，雖仍不離自我、人生觀與「主義」等五四思想史常見議題，但在闡釋方式與史料選擇上，明顯與傳統史家的處理手法大異其趣。王汎森更為重視歷史過程之中的話語形塑(如「新青年」、「進步青年」、「新民」、「新人」)、儀式象徵(如國旗、服飾、規矩)、信息傳播渠道(如政論、教科書、通俗小冊子、廣告、戲劇、公開演說)等。同時，作者主張採取「眼光向下」的視角，關注過往習焉不察的五四時期地方士人與普羅大眾，尤其是他們的道德熱情(或自我禁抑)所產生的涓滴之力，如何反作用於看似強大的社會與政治軀體。

細讀全書，王汎森對於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思想史研究，業已跳脫對其本質的探析和功過的評價^⑩，轉而致力於將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啟蒙意涵，從現代主義的諸多預設立場與目的(如尋求歷史規律、發現客觀真理等)之中解放出來，視之為一個充滿多元競爭又存在各種可能性與可選擇性的開放系統。因此，通過「重新問題化」的方式，本書開啟了五四新文化運動不同的窗戶，不僅是未來「重訪五四」的重要憑藉，對於省思近代中國的思想變局，同樣深具啟發意義。即使就五四新文化運動研究的現實意義而言，當今天的青年一代同樣因意

義世界空洞化、專制者恣意濫權、宣傳機器巧舌如簧、社會「內捲」(involution)和階層固化而深感煩悶之時，他們或許不難從王汎森筆下〈後五四的思想變化〉、〈反主義的思想言論〉等篇章之中，體悟到現實與歷史之間某些遙遠的相似性。

同時值得一提的是，本書在敘述上保持了作者一貫明晰雋永且擅長引譬設喻的文風，且往往化抽象為具象，讀來娓娓動人、真切可感。如書中多以「風潮」(頁38)、「天上大風」(頁57)、「颶風」(頁60)、「風起雲湧」(頁288)，比擬當日席捲一時的思想與思潮，取其形態多變、不拘泥於固定形態，以及無孔不入、進而滲透一切的特徵。或緣於此，作者亦曾在多處言及，思想史研究應當注重「察勢觀風」^⑪。而對於思想的「左右」影響，作者則喜用「轉轍器」(〈序言〉，頁x)、「毛細管」(頁65)、「編織」(頁70)、「調色盤」(頁97)、「光譜」(頁145)、「地圖」(頁192)等作比喻，提示讀者須注意思想與外在環境之間的逐層擴散、薰染(而未必是線性連接)以及互緣的特徵。書中又常把思想嬗變中的連續與歧異，比作「火箭一節一節地爆破」或「竹子一方面延續生長，可是又有竹『節』區分竹幹的各個部分」的過程(頁242-43)，頗具巧思且益人心智。

另外，本書校對略有小疵，如頁76《啼笑姻緣》當作《啼笑因緣》，頁233第二段開頭「若是回到新文化運動在『價值層面向西方學

習』這個比較傳統的階段分類，似乎可以說，在辛亥革命到袁世凱帝制失敗，確立了民主共和的政治價值後，才開始從政治社會語彙，以及廣義的從中國經世之學的角度而言，包括歷史學轉向更內核的以科學的訴求為核心凡知識論與形上學來展開探索以及概念建構，並批判傳統「一句不暢，等等。

總括而言，作者對於五四新文化運動的「重新問題化」，絕非有意淡化對於五四思想經典的縝密閱讀和對於啟蒙議題的實質性探討——蓋因「有意思」的問題，實未必等於「有意義」的問題。因此，新文化史的研究取向，雖然提供多個角度對於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深描細寫，但它能否由此真正孕育具有思想縱深的五四論述，仍然值得未來研究者不懈探索。

註釋

① 張灝：〈中國近代思想史的轉型時代〉，《二十一世紀》（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1999年4月號，頁29-39。

② 胡繩：《從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上、下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向新民主主義的過渡」見於下冊，頁907。

③ 李澤厚：〈啟蒙與救亡的雙重變奏〉，載《中國現代思想史論》（北京：東方出版社，1987），頁7-49；王德威：〈沒有晚清，何來五四？〉，載王德威著，宋偉傑譯：《被壓抑的現代性：晚清小說新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頁1-19。

④ 相關書評參見毛升：〈毛升評王汎森《啟蒙是連續的嗎？》〉

（2021年2月9日），澎湃新聞網，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1189841。

⑤ 王汎森著，王曉冰譯：《傅斯年：中國近代歷史與政治中的個體生命》（台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3），頁173-203。

⑥ 余英時：〈文藝復興乎？啟蒙運動乎？——一個史學家對五四運動的反思〉，載《文化評論與中國情懷》，上冊（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4），頁219-20。

⑦ 卡西勒（Ernst Cassirer）著，顧偉銘、楊光仲、鄭楚宣譯：《啟蒙哲學》（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1988），頁5。

⑧ 桑兵近年研究指出，在一般歷史敘述中，以《新青年》為核心的北京大學教授群體，被視為新文化運動的發動者，而新文化運動鼓蕩起五四愛國運動。但事實上，新文化運動發生於五四運動之後，而且是由北京大學、江蘇教育會和國民黨聯手發動。參見桑兵：〈關鍵年代的小歷史——1919年的事件與日常〉，《社會科學戰線》，2018年第1期，頁102-103。

⑨ 王汎森：〈思想是生活的一種方式——兼論思想史的層次〉，載《思想是生活的一種方式：中國近代思想史的再思考》（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8），頁6。

⑩ 周策縱著，周子平等譯：《五四運動：現代中國的思想革命》（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6），頁467-506。

⑪ 王汎森：〈「風」：一種被忽略的史學觀念〉，載《執拗的低音：一些歷史思考方式的反思》（北京：三聯書店，2020），頁144。

段煉 湖南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副教授，中國思想史研究所研究員。